

话说中国

百年记忆

卷四

主 编 李 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军事上的奇迹：二万五千里长征·····	(1)
黑夜中的指路明灯：毛泽东·····	(1)
遵义会议召开·····	(6)
四渡赤水·····	(13)
毛泽东说：不要让张国焘失望·····	(19)
张国焘意欲分裂中央·····	(23)
三大主力会师·····	(29)
我在北伐途中·····	(35)
二七大罢工亲历记·····	(61)
在郑州·····	(70)
在江岸·····	(71)
百色风暴·····	(79)
风云突变·····	(79)
百色揭竿·····	(89)
隆安保卫战·····	(100)
威震桂黔边·····	(111)
回师右江·····	(124)
朱毛井冈山会师·····	(139)

第四次至第五次反“围剿”	(145)
长征前的秘密准备	(159)
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	(164)
遵义会议召开前后	(169)
长征的艰险历程	(175)
回忆红二方面军	(181)
离开白区	(181)
在洪湖、湘鄂西搞暴动.....	(183)
回湘西打游击	(186)
整顿队伍、建立苏维埃.....	(189)

军事上的奇迹：二万五千里长征

黑夜中的指路明灯：毛泽东

1934年春，李德对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到了5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决定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向共产国际作了请示。在征得同意后，转移的准备工作即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间秘密进行起来。为了准备出发，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由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军事准备计划。

苏区，是革命的根据地，是红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鱼水相依，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区域。从1934年10月10日，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告别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尽管红军长征的准备工作是极秘密的，但是，蒋介石似乎预料到了红军突围可能性，10月中旬，对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作了具体判断。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在回忆蒋介石追捕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时记述：

1934年9月底，蒋介石认定江西围攻的大势业已完成，胜利在望，显得飘飘然。他每和我们侈谈形势时，洋洋得意地说：“湘鄂赣边红6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以此显示他的指挥比别人高明。在谈到红军历次提出北上抗日及合作抗日时，他总是诬蔑红军说：“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他强调说：“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抗日，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这些谈话正是暴露了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

国内舆论自塘沽协定之后到“五次围剿”后期，对蒋不抗日专反共的搞法早已不满，华北人民尤其激烈。蒋认为这都是对共产党同情，对当前“围剿”非常不利。为了便于一心对付红军，收最后围歼之功，约在1934年10月上旬蒋偕宋美龄下庐山去华北视察，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各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头目。当时“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回南京去了。蒋在北平接见的，有原东北的军政人员莫德惠、王树党、马占山等，在察接见宋哲元等，在归绥接见的有傅作义及蒙旗德王、云王、沙王等，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杨虎城、马鸿逵等。蒋对这些人大肆宣传他那“不是不抗日，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行”的反动谬论，争取大家同情地反共，以缓和国人对他不抗日的攻击。

10月中旬突接“南昌行营”传来情报，知道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丰江（即桃江），蒋鼎文东路军先头已由长汀逼近瑞金。于是蒋介石匆匆赶回南昌，立即召集部将

商谈对策，议论纷纷，对红军行动方向作了如下判断：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蒋认为：红军利在乘虚，如进入粤境，逼得粤军不得不排命抵抗，倘被前后夹击，是难于立足的，那是他们的不利之路，去了亦无足为虑。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蒋认为赣粤湘边区是政治上的薄弱点所造成的军事薄弱点，且中央红军入湘后有与贺龙部会合之利，应加重视。

（三）进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蒋认为这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可以考虑。

（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杨永泰以为还要考虑红军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蒋说：“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随后蒋还对大家说：“不管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又说：“红军不论走那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壮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长征之初，红军的指挥系统很复杂。当时，有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有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等。

博古、李德他们企图不丧失寸土，结果丧失了全部根据地；他们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这是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个历史性惩罚。

然而，红军的突围转移，一开始又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按照博古、李德的原定计划，是西进湘鄂川黔边，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因此，他们舍不得丢掉原来的“家当”，八万六千人中，携带着大批物资器材，多达一千多副担子。十余门山炮拆卸开来，一个炮筒就得四个人抬；还有各种机器、纸张，十分累赘。几万人马沿着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行进，常常一夜只能走几公里，或者只能翻一个山坳，走走停停，无谓地消耗着体力。致使大批战斗部队成了掩护队和运输队。根据李德的部署、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在左翼，后面为罗炳辉、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由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在右翼，后面为周昆、黄苏率领的红八军团，从两翼掩护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作甬道式前进。

如此规模的突围转移，其战略走向很快为蒋介石所洞察，在红军去湘西的必经之路，蒋立即增派兵力，加强封锁，组成了四道封锁线：

第一道设于江西西南的赣江、漳水间；

第二道设于湘赣边界；

第三道设于粤汉铁路干线；

第四道设于湘江两岸。

红军经过一个月的苦战，突破了三道封锁线。蒋介石调动四十万大军，依靠湘江的天然屏障，摆下了阵势。11月下旬，红军向湘江挺进。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上面写着：“我们奉总司令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来！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好的天罗地网！”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从宣章至湘江广大地区敌人防御力量薄弱，便于我军机

动，如果红军能抓住战机，乘势调动敌军，利用敌人部署的空隙积极行动，寻机歼敌，形势就会发生变化。

蒋介石为了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以东地区，早在 11 月 6 日红军进入湘南的门户汝城地域时，就判断红军可能沿 6 军团的路线，从兴安、全州之间西进，因而千方百计调动军队，精心部署第四道封锁线。

11 月 12 日，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率领在湘各部队和团队，共 169 师 77 个团专事“追剿”，实现歼灭我军于湘水以东的作战计划。

根据蒋介石的企图，何键决定集中主力于黄沙河、零陵、东安一带，包围我军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为此，敌人共投入兵力约 26 个师，近 30 万人，在湘江以东地域部署了一个大包围圈，企图在湘江东岸逼我决战，依仗其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将我军歼灭。

蒋介石同时命令粤军陈济棠以有力的部队进至粤、湘、桂边进行截击；命令桂军白崇禧以 5 个师的兵力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堵截。

为了实现追堵红军的美梦，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凋遣是非常忙乱而急促的。

当时，国民党军队虽然比红军多 4 倍，而且早有准备，但是，他们貌合神离、互相猜忌、矛盾重重而无法解脱。

在国民党诸多军队中，只有湘军的行动积极，而位于红军右侧和后面的蒋系薛岳、周浑元的部队行动迟缓，两广部队只在其边境防堵，并不主动进攻红军。桂系军队由于有自己的小算盘，战斗力更是受到影响。

广大指战员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数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真是“国难思良将”！此时此刻，在这支西征的红军队伍中间，从普通战士到军团首长，从勤杂人员到军政干部，从一般党员到中央领导，有多少人在想念着毛泽东！大家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了。

军心所归，党心所向，这可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

遵义会议召开

今后的仗怎么打？红军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毛泽东比谁都着急。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的意见提了一次又一次，却一次又一次地被顶了回来。西征突围转移前，毛又建议熬上二三个月，以便作必要的准备。但蒋介石大军压境，博古、李德于匆忙之中，下令红军突围。这种被毛泽东称之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方针，不失败才怪呢！

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公开提出要讨论失败的问题。

讨论这个问题，谈何容易。自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博古等在政治上推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的同时，在组织上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党内一有不同意见，即被按上“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等大帽子。那时，不要说讨论他们的过失，就是提一些合理化建议，也被指责为大逆不道。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博古束手无策，李德一筹莫展，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是到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辰光了。

首先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意见的是王稼祥。

王稼祥（1906～1974），原名嘉祥，又名家蓄，安徽泾县人。1925年冬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共，1930年3月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1931年4月与任弼时、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团赴苏区。此行是奉命推行“左”倾路线的，自然受到了毛泽东的抵制。同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王被增补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后兼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然而，经过一个时期的相交与了解，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和建军原则深感佩服，对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颇为赞成。1932年宁都会议上，他力排众议，提出应该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军事领导岗位上指挥红军作战，意见未被采纳。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王稼祥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十分不满，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直言不讳地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红军西征突围时，因王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被敌机炸伤，肠子被打穿，不得不躺在担架上行军。事有凑巧，毛泽东也因身患疾病而坐担架。于是，从撤离苏区的第一天起，他俩便朝夕相处，

有机会会有时间一起分析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研究党和红军的前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毛泽东提出要讨论失败的问题，王稼祥则更明确地表示，红军的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应该把博古、李德等人“轰”下台，“讨论失败的问题”是把博古、李德“轰”下台的前提，王与毛都往一块儿去思考了。

王稼祥已经完完全全地站到了毛泽东一个立场上。

毛泽东的意见，也得到了张闻天的支持。张闻天（1900～1976），原名应皋，上海南汇施湾（今属川沙）人。在这前后一直以洛甫为化名。1925年6月加入中共。同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2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进入苏区，1934年，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不久又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是中共党内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刚进入中央苏区时，张闻天便参与了反对“罗明路线”的领导，作报告、写文章，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可不久，通过接触和了解实际斗争的情况，在理论和实践的碰撞中逐渐觉察到“左”的那一套行不通。同时，又与毛泽东在一起工作，慢慢开始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和本领”。相反，对“左”倾领导产生了怀疑和否定。广昌战役时，因竭力反对那种死拼硬打的方针，因此与博古发生了公开冲突。西征突围时，又正好与毛泽东、王稼祥指斥李德，张闻天较多地谈论他与博古的争论，毛泽东则耐心地分析“左”倾盲动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及其挽救办法。王、张都赞同和支持

毛泽东的意见。

但是，毛泽东的意见能否被采纳，起关键作用的还在于周恩来。周恩来是三人团的成员之一，湘江战役前，实际指挥权掌握在李德一人之手，但一过湘江，由于军事的失利，博古、李德灰心丧气，开始消沉了。“疾风知劲草”，周恩来于危难之中，挑起了指挥部队这副重担子。周恩来当家，为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重新崛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4年12月上旬，红军渡过湘江后沿着崎岖难行的西延、龙胜山区继续西进。11日，红军一部占领了湖南西南端一个地处桂湘黔三省交界之处的县城——通道。

此刻，中央红军正面临着极端危险的处境。蒋介石早已判明红军的行动意图，在红军通往湘鄂西的前进道路上部署了二十万兵力，赶筑工事，张网以待，准备来个第二次“湘江之役”。以全歼红军的主力。如果仍按照原定的行军路线，无疑是自投罗网，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危急关头，中央军委在通道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与会者除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以外，再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和朱德等。毛泽东自从被夺了军权后，两年多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第一次有了可以发言的机会。于是，毛泽东滔滔不绝地分析了当前敌我态势，把进军途上的困难一条条摆出来，建议放弃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这样，既能使蒋介石精心部署的罗网置于无用，又能使跋涉千里、苦战两月的部队得到稍事休整、补充，然后去创建新的根据

地。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的赞同和支持。博古、李德虽然竭力反对，但自己又提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同意改道贵州前进。至于红军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会议以多数通过一项决议：留待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终于又有了发言权！

然而，通道会议上的争论并没有结束。一个星期以后，中共在黔东南山顶上的黎平县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心议题仍然是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会议一开始，两种不同的意见就争论开了。

由于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会议正式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原定计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斥毛泽东后，中共中央在重大的决策问题上，第一次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周恩来起了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

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举行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这样，从通道到黎平到猴场的三次会议，成了红军历史上改变错误路线的开始，并为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作了准备。

三次会议终于有了最后结果。1935年1月上旬，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四团在耿飚、杨成武指挥下智取遵义，中央机关随后入城。按照黎平会议决议，

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地点在遵义黔军师长相辉章的西式洋房里；时间是1月15日至17日。参加这次会议的共二十人，他们是：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担任会议的记录工作。邓小平在批“江西罗明路线”时被撤职，长征开始后任《红星》报主笔，遵义会议前复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此外，还有两位列席者：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会议先由博古作主报告，他竭力为“左”倾路线辩护，诉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一是敌人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而只字未提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博古报告结束后，即由周恩来作军事报告，史称副报告。周在报告中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和战略战术约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光明磊落地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接着，张闻天拿出了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强调了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是“机会主义的结论”。王明、博古等人平时最爱给别人戴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现在居然有人把这项桂冠奉还给了他！

张闻天的报告被称之为反报告。张报告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历来讲策略，他的发言集中在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上，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的方向。毛泽东指出，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了？他驳斥了政府、组织支持战争不够的观点，并举出许多例子说明。毛的发言的主要内容，就是后来写在遵义会议决议上的内容，而且集中批评博古、李德二人，主要是博古，争取了多数。

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首先表示支持，紧接着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刘伯承、李卓然、陈云、刘少奇……，大多数与会者都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发言中还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毛泽东重返党中央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岗位，已经成了众望所归的事情了！

经三天的讨论，遵义会议最后通过了几项决定：

一、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党支部去讨论；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三、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统治了中共长达四年之久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至此结束。

遵义会议后，1935年2月，在云贵川交界处贵州省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中共决定在常委分工方面由张

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3月11日，在贵州省鸭溪、苟坝一带，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处理最紧迫的军事指挥工作。这个小组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无疑成了新的三人小组的核心。

中共最高领导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博古，一个个如大浪淘沙，都在实践中证明是无法引导中国革命去夺取胜利之果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和军队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掌起了革命之舵，这是毛泽东人生旅途上的一个转折点，是中共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四渡赤水

说来也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一经确立，几乎陷入绝境的红军便开始神奇般地恢复了活力，蒋介石那一套对付红军的办法又失灵了。

1935年1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抵至遵义地区时，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行动有三种可能：一是向东回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北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三是过金沙江西进。

蒋介石估计第三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条路线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过的绝路。因此，落在三个方面都作了布防，而以主力集中在东、西北面，企图堵截中央红军北进或东出湖

南，将红军限制于乌江西北，再以川、湘、黔、滇及中央军薛岳兵团，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合围而聚歼之。

红军面临着十分险恶的军事形势！遵义会议后处于决策地位的毛泽东，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红军当时正处于两江（乌江、长江）之间，回旋余地有限，而且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下，形势相当不利。根据红四方面军提供的情报，四川境内军阀之间矛盾尖锐，四方面军已在川北建立了大块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进入川省，可以得到四方面军的配合，利用军阀矛盾，求得恢复和发展。因此，毛泽东决定：渡赤水，过长江，北上四川。

这条路线，是蒋介石估计的第二种可能。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分兵三路北上，向赤水河挺进。

赤水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这条不太有名气的河流，它的名字因同毛泽东的用兵连在了一起，从此被写入中国革命战争的史册。

1月29日，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的古南县境，并向叙水推进。蒋介石得此情报，立刻命令川军调集兵力，集中于川黔边境，在长江构筑了严密的封锁线，阻挡红军北渡长江。蒋介石并下令薛岳部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从湖南赶来，形成对红军腹背夹击的态势。在这种状况下，中央红军按原计划入川非常困难。毛泽东自投身军旅以来，一直强调由于战场形势的多变性，在作战中一定要坚持“活用原则”。毛泽东认为，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过程。“如